

Localization

Strong Misreading

Self-projection

革命路上

杨 露 / 著

翻译现代性、阅读运动与主体性重建，1949—1979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000000

革命路上：翻译现代性、阅读运动与主体性重建，1949—1979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117-5704-7

I. ① 革…

II. ① 杨…

III. ① 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 J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

革命路上

翻译现代性、阅读运动与主体性重建，1949—1979

杨 露 / 著

书
号
印
开
字
印
张
定
价

真：(010) 00212838

邮：全国新华书店

印：北京崇文门内大街100号

本：787毫米×1095毫米 1/16

字：400千字

印：25

定：35

价：35

印刷厂

；cnp@ccit.com

；cnp@ccit.com

010-2512348

中心同 寄 邮

050082

本社平装书每册定价：北京

本社平装书每册定价：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革命路上: 翻译现代性、阅读运动与主体性重建, 1949—1979/ 杨露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17-2794-7

I. ①革…

II. ①杨…

III. ①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8677 号

革命路上: 翻译现代性、阅读运动与主体性重建, 1949—1979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廖晓莹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目 录

绪 论	1
(一) 问题与材料	1
(二) 基本概念与研究命题	5
(三) 方法论的更新	24
(四) 结构与分章	43
第一部分 西方现代性的自反：从《在路上》到《等待戈多》的 “不安的自由”	59
一 《在路上》：奔跑的普鲁斯特	63
(一) 文献回顾	64
(二) 自发性写作	68
(三) 自反性的个体	78
二 《麦田里的守望者》：彷徨的反英雄	90
(一) 文献回顾	92
(二) “少年史卡兹”风格	96
(三) 反英雄的个性危机	100
三 《等待戈多》：一出悲喜剧背后的现代性	115
(一) 文献回顾	116
(二) “怎么说？”	120

(三) 等待什么?	124
第一部分小结	130
 第二部分 翻译现代性: 跨境的翻译	137
四 翻译的政治: 翻译的体制化	141
(一) 文献回顾	143
(二) 1949—1979: 意识形态的体制化	148
(三) 1949—1979: 诗学理念的体制化	153
(四) 1949—1979: 赞助人的体制化	155
(五) 1949—1979: 体制化文艺批评的“强势误读”	159
(六) 结语: 毛泽东时代的翻译体制化	163
五 1949—1979: 译者的特殊性	171
(一) 黄雨石	174
(二) “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 黄雨石的实践翻译观	175
(三) 施咸荣	182
(四) “通俗文学”的沉浮: 施咸荣的翻译为读者的 翻译观	185
(五) 结语: 译者的主体间性	190
六 翻译体制化的烙印: 《在路上》的第一个中译本	194
(一) 石荣本《在路上》的语词选择	198
(二) 石荣本《在路上》的情节删减	201
(三) 翻译《在路上》的自反性的个体	205
(四) 翻译《在路上》的自发性写作风格	209
(五) 结语: 翻译中的自我审查	212
七 译者的特殊翻译策略: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 第一个中译本	216
(一) 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语词选择	221
(二) 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情节删减	225

目 录

(三) 捕手还是守望者? 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 人物	227
(四) 少年史卡兹: 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风格	230
(五) 结语: 特殊的翻译策略	234
八 现代性困境叙说的本土化:《等待戈多》的 第一个中译本	238
(一) 镜中的读者	240
(二) 翻译英文本还是法文本?	244
(三) 翻译悲喜剧之“喜”	245
(四) 翻译悲喜剧之“悲”	247
(五) 结语: 全球化的文本与在地的翻译	250
第二部分小结	251
第三部分 反思与自反: 阅读中的反叛一代	257
九 地下阅读运动: 主体的压抑与“自我投射”的 阅读	266
(一) 文献回顾	266
(二) 个人私密空间的压缩	272
(三) 地下阅读运动	277
(四) 地下阅读运动中的《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 《等待戈多》	282
十 “告别革命”的书写: 从翻译语体到个人化的 写作试验	291
(一) 文献回顾	294
(二) 翻译语体: 以艺术试验“对抗话语”	297
(三) 个人化写作: 新的写作试验	305
第三部分小结	313

结论: 互动——告别革命的全球化时代	319
(一) 禁书: 打开一扇窗	320
(二) 革命的遗产	323
(三) 像一个悖论: 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焦虑	328

附录: 1949—1979 年作为内部书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列表	337
---------------------------------------	-----

绪 论

“翻译或许是一个不可能性、一次背叛、一场欺骗、一个发明、一道希望的谎言——但在过程中，它使读者成为一个更有智慧、更好的听众：比较不确定、更为敏锐、更幸福（seliglicher）。”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①

（一）问题与材料

1970年代不仅孕育着中国政治上的转折，也隐示着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正是一批在五六十年代翻译的书，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在1970年代逐渐散落民间，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翻译和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以及当今中国对主体性的理解，但是研究这一现象的学术性论著较少，能够论及二者间的有机联系及互动的就更少。本书旨在全面地解读1949—1979年中国翻译、阅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现象，并将重点放在译者和读者的能动性，以及他们共同建构的主体性话语的多样叙说。本书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包括：中国

^① [加拿大]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0页。

究竟出于何种“实际的目的或者需要”^① 翻译、出版这些显然与当时意识形态对立的文本? 体制内的译者通过翻译这些文本在思想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这些译本又是如何进入阅读的仪式, 在下乡知青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这些问题的提出, 首先是因为某些译作曾影响了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不仅在各种回忆录中被不断提及, 也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更为关键的是, 源文本中的“话语”如何被翻译, 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怎样的语体转换,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意义阐释权的转换, 涉及中国 1970 年代开始对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和围绕新的现代性理念而起的主体性重建。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这三部西方现代派的里程碑之作在中国的翻译和阅读。本书之所以选择这三部作品对其进行文本分析, 并研究其在中国的翻译和阅读, 首先是因为这三部作品在关于“文革”时期的阅读的回忆中被频繁提及, 并非是预想中设定的读者群的选择令这一现象变得有趣。其次是由于这三部在阅读中最受欢迎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是由同一译者译出。这似非一个偶然事件, 而是与译者的主体性有关。第三, 借助对这三部作品从原著到翻译再到对中国的影响的“跨境”考察, 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开启对中国政治上的转折和文化上的重大变迁的历史思考与讨论。

通过考察这三部西方现代派代表性文本的翻译和阅读, 本书将试图说明: 第一, 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凸显的个体化和自反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呼唤着翻译和阅读, 这些为了批判而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派作品是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地下阅读中主体性重建的重要来源; 第二, 中国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翻译逐步被纳入体制, 具有主体间性的译者通过翻译现代性的文本为中国的年轻人带来了一场头脑的风暴; 第三,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末的知识青年在这些译作中开始了“自我投射”的阅读,

① [美] 刘禾:《跨语际实践: 文学, 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 1900—1937》, 宋伟杰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 第 3 页。刘禾认为, 这种“实际的目的或者需要”实际上维系着一整套的方法论, 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1980年代所谓的“新启蒙”、“告别革命”、与中国社会的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进程实肇于此。

本书的第一部分，逐一对《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源语文本进行文本分析，找出那些在中国的“自我启蒙”、“告别革命”与“社会的个人化”中成为助力的、或被忽视的“话语构成”因素。换句话说，这一部分力图揭示原著中反思社会个人化和自反现代性的因素，而这与续后的翻译和阅读研究都有关系，将会成为笔者解读这三部作品的翻译和阅读的基础。无论是以1949—1979年中国的翻译史或是以阅读史进行考量，这三部作品的地位都离不开它自身提供的呼唤翻译的因素，所以只有在建立了对原著的分析之后，我们才能去触碰一些对于整个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这些西方现代派的文本如何描述后现代主体性的困境，从而吸引了当时高度体制化的中国对其进行翻译和阅读？在“翻译”和“阅读”之间的“他者”形象是统一的，还是存在裂痕？在阅读之中，又是如何点燃了星星之火，引发思想史上的变革？

本书的第二部分论述这三部作品在毛泽东时代的翻译。1949—1979年有一批西方现代文学被翻译过来作为批判的对象。这些作为被批判的对象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主要包括：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卡夫卡的《审判》、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艾吕雅的诗歌、杜拉斯的《琴声如诉》、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诗歌、尤内斯库的《椅子》、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当时中国之所以会翻译这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中苏关系的变化是其重要的导火索。第四、五章说明，“内部书”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和中苏论战及交恶有很大关系。在文学系统内部，当时中国文艺界与苏联文艺界对西方文学的态度有着十分重要的差别。这一差别在于，苏联文艺界对西方文学抱持着美好的想象，认为文学应该“找到共同的语言”、“达成协议”，而这一态度在当时中国的文艺界看来是“反

革命”的。^① 所以出版针对苏联的“内部书”——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被视为防止社会主义内部变质的重要一环。^② 这批翻译、出版于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的“内部书”^③, 主要供一定层级的文艺界领导和党的干部进行阅读和批判。更进一步说, 翻译、出版西方现代派作品与中国1949—1979年期间翻译体制化这一持续过程的目标是一致的, 即实质上要使中国的知识精英和领导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摒弃西方式的现代化, 使翻译成为维护当时中国对现代性理想叙说的合法性的战场。^④

这三部作品在非西方、特别是在中国受到出人意料的欢迎, 并造成意想不到的影响。这是本书第三部分的主旨。“文革”时期在青年人中进行的地下阅读运动, 是这三部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派代表作获得广泛阅读的重要契机。地下阅读的对象, 有一些是曾经公开发行但后来不符合意识形态教育的书刊, 包括: 西方哲学社科类的通史、通编、中国的

① 师红游:《揭穿肖洛霍夫的反革命真面目》, 人民日报, 1967年10月22日, 第5版。

② 参见戴维德·梅尔斯(David A. Mayers)的《劈开磐石: 对抗中苏同盟的美国策略》*Cracking the Monolith: U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陈兼(Chen Jian, 1952—)的《毛泽东的中国和冷战》*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等著作。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 中苏关系逐渐出现裂痕。1956年, 在苏共二十大上,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等引起中方强烈反应, 1958年中苏正式反目。顾问石仲泉、主编杨先材:《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 第688页。由于国家利益冲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识不同发生了一系列论战, 最终形成中苏交恶的局面。

③ 1978年后, 内部书几乎从人们视野中消失, 不过仍然有少量书籍以内部书形式出版, 如:《托洛茨基回忆录》(1991年出版)、《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1992年出版)、《古拉格群岛》(俄国索尔仁尼琴著, 1996年出版)等。2004年人民出版社还以东方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内部书——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包括王明的《中共50年》、陈公博的《苦笑录》、《中国记事》(李德)、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等。虽然该书系的发行对象、范围以及发行者的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 但是重点是打击盗版, 既未做任何修改和删节, 而且普通读者亦可买到, 与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内部书”有明显的不同。

④ 一定意义上, 毛主义激进现代主义的梦想是重新将中国视为“世界中心”。

古典小说、诗文，也有一大批苏俄和西方的“经典”文学作品。^①但是，更受欢迎的则是非公开发行的“内部书”。对此，李零回忆道：“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19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②“内部书”由于涉及当时颇为“异端”的思想，如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人学、存在主义、反思理性和非理性生活方式等，对于青年来说最感刺激，也最受欢迎。其中，在地下阅读中被反复提及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最常出现的三部作品就是本书的研究对象——美国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爱尔兰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③这三部作品都是经同一译者施咸荣（1927—1993），《在路上》主要为黄雨石（1919—2008）与施咸荣合译，由英文译出，分别于1962年、1963年和1965年内部发行。它们通过内部发行的形式问世，经过偷书、抢书、换书、抄书、说书等过程超出了其设定的阅读范围，又通过读书会、通讯会、沙龙、或者个人间的互通有无改变了个人阅读的格局，进而影响了中国1970年代以来在文学和思想领域对主体性的重新认识。

（二）基本概念与研究命题

通过翻译和阅读这一角度，本书将会探讨1970年代文学和文化上

-
- ① 属于这一种情况的书籍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哲学社科，被提及较多的有：《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西方美学史》。一类是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被提及较多的有：《中国通史简编》、《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以及《古文观止》、《唐宋名家词选》、《白香词谱》、《唐诗三百首》、《全唐诗》等。还有一类是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被提及较多的有：《普希金诗选》，屠格涅夫的《罗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勃朗特姐妹的书，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集》，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等。
- ②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北岛、李零主编：《七十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49页。
- ③ 根据：（1）萧萧列出的40本左右对这一代人的思想历程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内部读物”；（2）宋永毅在 *A Glance at the Underground Reading Movem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列出的8本“黄皮书”、10本“灰皮书”；（3）凤凰网国家阅读史专题的实时统计，以及作者本人根据各种回忆录、访谈进行交叉比对而得出。

的重大变迁,即对主体性的认识由“集体”转向“个人”的这一变迁,是如何发生在“文革”这一从1960年代末持续到1970年代末的历史事件的阴影之下。这一变迁在当代中国文学新的地貌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与今日有关“现代性”的中国模式(China model)的讨论密切相关。

《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呈现了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通过翻译和阅读这些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之作,“主体性”之思重新升腾,并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之所以说是“重新升腾”,是因为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就曾运用“人道主义”树起反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启蒙旗帜,而1970年代末开始的有关“主体性”的思考不过是带领中国思想界重返启蒙立场。但是从五四“人道主义”的启蒙立场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新启蒙”立场,并不只是一场回归。五四“人道主义”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伦理纲常,对于一切“现代”的东西他们都欢呼雀跃。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新启蒙”^①立场反思的主要对象却是1949—1979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对1954年以来就力图走上“现代化”^②的中国道路的反思。继而,对“新启蒙”立场的反思又引发了1990年代开始的“反思现代性”思潮——在怎样评价1949—1979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上的分歧导致了有关“现代性”的中国模式的论争。尽管在1949—1979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是“封建的”、“专制的”还是具有“现代性”的问题上,“新启蒙”的立场为“反思现代性”思潮所诟病,但是“新启蒙”这一思潮本身就有“现代性”的特征。这使得“现代性”成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为频繁出现的关键词。

①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58—97页。“新启蒙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且严密的思想体系,而是具有“态度的同一性”。

② 1954年9月第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是革命的目的。

因而，当我们审视1949—1979年中国翻译、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历程，并试图回答那些被林培瑞（Perry Link，1944—）称为中国“抵御外来污染的盾牌”^①的内部发行方式对读者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1949—1979年中国翻译和阅读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一现象背后的“现代性”概念进行整理和评估。

1. 现代与现代性的语源

为何可以从翻译和阅读西方现代派文学来探讨“现代性”的问题？这有必要从“现代”、“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的关系说起。在此，有三个关键的概念值得注意，分别是：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义（modernism）。围绕着“现代”（modern）一词生成的这三个概念由于不同学科领域对其的多样叙说使它们显得有点像一团乱麻。一定意义上来说，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义（modernism）这三个概念并非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但却同根同源，血肉相连，都起源于西方。正如伊夫·瓦岱（Yves Vade，1933—）所说：这些概念正像其“所表示的既复杂又矛盾的现实一样，一直不明不白”。^②例如，身为文学家的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身为哲学家的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身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德里克（Arif Dirlik，1940—）等人对这三个概念的应用大相径庭，而他们的审视角度和理论论述各有不同。对于在一定意义上扩展为一个关系整个人类命运的整体工程（project）的“现代性”，本节将首先追溯现代与现代性的语源和历史演变。

就语源上来看，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的同一词根“现代”

① Perry Link, *The Use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4.

② [法] 伊夫·瓦岱（Yves Vade）：《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modern), 它指代的历史时期一直在变化。根据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研究中世纪至现代法国文学的著名学者尧斯 (Hans Robert Jauss, 1921—1997) 的考证, “modern” 一词来自拉丁文 “modernus”。这个词出现于公元 5 世纪, 曾是基督教用语, 意思是“当时、现时的”(the present)。^① 尧斯揭示了虽然在一般认识中作为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诸概念基础的“现代”与欧洲告别神权的世俗化联系在一起, 但从语源来说, “现代”一词最初指的却是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 用以区别属于异教的古罗马社会。^② 现代一词与中世纪构成一种对比的观念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渐成形。卡林内斯库 (Matei Calinescu, 1934—2009) 指出, 在中世纪的世界剧场 (theatrum mundi) 的理想中, 中世纪是暗夜, 但现代并不是白昼, 而是以一种黑暗即将过去的姿态出现, 只有古典的古代才是真正的光明。^③

清楚了“现代”一词, 那么, 究竟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性”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modernitas, 11 世纪时既已出现。“现代性”一词最初是一个单纯的标示历史时间的概念。后来则用以表示“作为现代的一种品质或情境”, 例如在《牛津英语词典》中 “modernity” 一词就被解释为 “the quality or condition of being modern”。“现代性”在启蒙哲学家蒙田、培根、笛卡尔的著作中虽然得到一定的肯定, 但是主要是针对中世纪的欧洲社会, 并不具有普世意义。^④ 对此, 哈贝马斯说: “由启蒙哲学家们在 18 世纪精心阐述的现代性规划, 是一种遵循其内在逻辑坚持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与自主的艺术的努力。同时, 这个规划旨在把每个领域的认知潜能解放出来, 是指从令人费解的宗教形式中

① 另据社会学家克里尚·库马尔的说法, “modernus” 起源于拉丁语 modo, 也就是说在公元 4 世纪出现。谢立中: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 北京大学学报, 2001 (5), 第 25—32 页。

② 河清: 《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 香港: 三联书店, 1994 年, 第 17 页。

③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9—20. 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也有类似的十分有意思的趋势。他们对上古时代的好感延伸到对整个古代的留恋。

④ 陈嘉明: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1 页。

摆脱出来。”^①

“现代性”的概念在19世纪至20世纪产生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对话，逐渐成为普世价值之一种。在德里克为“现代性”下的定义中，“现代性”具有社会和文化双方面的意义。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起源于16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并且现代性将现在与过去区别开来，庆祝这种区别。^②“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这一理解来自福柯。在福柯对“现代性”的讨论中，“态度”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③

对于吉登斯来说，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并且总是正面的态度，过于简单了。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现代性理论家之一的吉登斯，主要“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④他对现代性的定义前半部分与德里克相似：现代性“涉及了约莫自17世纪以来，出现在欧洲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社会组织的方式，随后其影响或多或少地遍及全世界”。不过他又说，“如是的界定将现代性关联到一个时期和一个地理上的出发点；但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却仍然未被触及地堆放在黑箱之中”。^⑤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提出“现代性”是一种“后封建的欧洲

①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对后现代性》，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3，147页。

② Arif Dirlik, *Global Modernity: Modernity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7), p. 164.

③ [法] 福柯：《何为启蒙》，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30页。

④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

⑤ Anthony Giddens: *Konsequenze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7), p. 9.

所建立而在 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① 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性”作为一种制度的转变, 与传统的“断裂”, 他将其称之为一种“后传统的秩序”。^② “断裂”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但这一“断裂”也带来诸多现代的困境。因此, “现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并且在直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吉登斯展开了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与批判。

总之, 从现代和现代性的语源可以看出, “现代”的唯一一个一直的对手是“传统”, 而非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更进一步说, 以“现代”为语源的“现代性”也代表了与“传统”的某种关系。在与“传统”的关系中, “现代性”显现自身。

2. 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与中国, 1949—1979

对于 1949—1979 年中国阅读和翻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现象的研究来说, 首先, 有必要将现代性与美学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相当直接地提出: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在许多地方都涉及现代性的美学话语, 或者说, 两者在许多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③ 只不过, 新保守主义者有意将现代性限制在技术和经济层面, 而不愿开启其在道德和艺术上的潜能, “相较而言, 新保守主义者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现代性, 它已经被缩小到受到限制的技术和经济层面, 而且随后枕卧于残存的传统之上, 与此同时, 普遍道德的潜能和自律的艺术被贬值”。^④

其次, 对于现代性的讨论, 并非大的、抽象的理论, 而是切实与“人”相关的问题。虽然如同大卫·哈维所说, “现代性”是一个关乎全

①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赵旭东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第 16 页。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年, 第 3 页。

③ Jurgen Habermas, Frederick Lawrence tran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7)。[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年, 第 1 页。

④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线——哈贝马斯访谈录》, 李安东、段怀清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第 123 页。